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经济意义

○ 张 彪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省情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命运共同体”主要指在维护和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的理念。分享、合作、共赢、包容等是其中的关键。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文明观。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崭新的全球治理观,有利于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也给中国外交层面赋予了现实的意义,如对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关键词]同舟共济;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合作共赢

一、“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内涵

人们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认识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强调“和合”“贵和”“和为贵”,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都非常反对战争。古书《孙子兵法·九地》记载:“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当其同舟而济”原本就是指打仗的时候,指挥千军万马善于用兵,能够使全军齐心奋勇,首尾呼应。即使是像互相仇视的吴国人和越国人,同船渡河,如果遇到大风的时候,也能够互相救援。“同舟共济”多比喻为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战胜困难,有时也喻为利害相同。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同舟共济,既然大家同乘一条船,必然是风险共担,生死与共,齐心协力,团结一致,遇到困难一起担当,遇到利益一起分享。正如中国古语讲“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命运共同体”体现“和平占优”“共赢取代零和”的时代主题。它源于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期待对战争破坏性行为予以限制与约束,而在冷战结束,第三次工业革命直接导致世界经济进一步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命运共同体”显得更具现实意义。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人类的认识与行为已经逐步超越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特别是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东方文明中的“以和为贵”“仁义”等理念推动国际体系向友好与合作的目标加速转化。^[1]

从实践角度而言,在中国政府提出“命运共同体”主张之前,欧洲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相关实践:冷战结束以后,欧洲以“煤钢共同体”为发端,逐步建设摒弃战争、主权共享、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欧盟委员会通过设计和传播如“欧洲公民”“欧洲文化区”“欧洲命运共同体”等新概念,创造共有象征符号,努力培育共同集体记忆和文化追忆,成功建设了欧盟模式的“命运共同体”。可见,“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就是分享、合作、共赢、包容,旨在维护和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照顾到其他国家的关切,以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推动“共同体”国家一起发展。其价值追求本身就集中体现了互相包容的权力观与合作共赢的利益观。概括起来包括以下主要层面:

(一)政治上相互信任。相关国家必须高度重视政治上的引领作用,共同努力做到政治上相互尊重、共同协商,消除疑虑、扩大共识、巩固友好、深化互信,经常性就地区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还要通过升级政治、社会和人文合作,消除信任猜疑,不断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强化命运共同体的根基。

(二)经济上互利共赢。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必然是不同地区国家间互补发展、合作共赢,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不同自然条件与文明要素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必然不断形成利益共同体。

(三)文化上多元包容。建设命运共同体,必须尊重各国的传统文化,包容互鉴,增进交流,多元发展。由于各国历史发展与文明传承不同,客观上会产生文化多样性的差异,往往容易发生矛盾与冲突。各国通过共同体内部交流逐步达成文化认同,促进更多的合作和自控,不断形成命运共同体内各国、各民族间的“相互交融”以及对价值、承诺、信念等的共享。

(四)安全上相互帮助。安全在国家利益中居于核心位置,在安全议题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才能谈得上命运共同体。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安全时必须充分考虑他国安全,应不断摒弃冷战威慑思维,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观。

(五)外部关系上开放合作。在外部关系上完全自愿和平等,既可以参与命运共同体,也可以不参与,虽然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不带有强制性。命运共同体高于自然共同体,而低于使命共同体。使命共同体基于一种共同的责任和义务,成员国有着较强的改造世界或地区秩序的使命感。

当今世界,中国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的行动倡议^[2]。伴随着人类历史进

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振兴崛起的同时,也正在悄悄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在不断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更加希望 and 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缔结长期友好关系,保持全方位通力合作,以利推动共同繁荣。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产生的影响力当然会越来越大,与外国之间的各种联系会更加紧密,倡导建立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从周边繁荣稳定的长远考虑,着眼于亚洲乃至世界未来的共同福祉,谋划全球发展共同利益的举动,更是遵循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围绕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共谋地区共同安全与发展的做法,既富实践内涵又具理论创新意义。^[3]这表明中国积极主张打造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在维护和发展本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同时,努力承担自身的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谋求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注重分享利益、包容发展、合作共赢。构建命运共同体需要从多种共同利益需求出发,即注重将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需求进行广泛而又深度地融合。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 10 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围绕如何携手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发表了重要演讲,明确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并从五个方面论述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即: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4]

首先,“命运共同体”倡导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当前,世界各国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力,理应同舟共济,权责共担,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理应共同坚守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权力观。习近平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积极倡导:“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维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5]。打造“命运共同体”旨在维护国际间的公平正义,积极倡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根据国际规则处理国际事务,共同协商处理全球性挑战,建立多边的、合作的、共同的安全体系,维护整个全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其次,“命运共同体”的要义是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曾几何时,处理国际利益与纷争往往认为零和博弈才是唯一选择,由此观点更易引发各种派生矛盾与冲突的加剧。然而,随着金融危机、恐怖袭击、难民危机、气候问题等全球共性问题的产生与蔓延,各个相关国家间的利益趋于高度交融,并越来越成为全球性共同利益链条中的不可或缺一环。一旦哪国以邻为壑、转嫁危机都可能导致全球利益链中断,损人未必利己,甚至一损俱损。习近平主席就曾在 G20 领导人峰会上呼吁:“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6]。基于此,面对全球新形势、新挑战,从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出发,各国共同秉承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努力推动优势互补、共谋发展,以实现更加平等、公平、均衡、繁荣的和谐世界。

第三,“命运共同体”本质特征是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文明具有多样性,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融合,汇成了人类文明奔流不息的长河。正是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才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

打造命运共同体是从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现实出发,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共同期盼,更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大趋势。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摆在亚洲国家面前的共同机遇,协力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在亚洲区域内的成功实践,既是亚洲人的智慧与勇气的集中体现,又必将促进实现亚洲的可持续发展。“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对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传承和创新,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的精髓和方向。中国将持续深化同亚洲国家的互信互助,全方位推进睦邻友好合作,也希望地区国家与我们携手努力,探索亚洲道路,彰显亚洲智慧,共建亚洲繁荣,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更大贡献”^[7]。

二、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经济意义

命运共同体体现了崭新的全球治理观。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由联合国倡导,国际上 28 位知名专家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于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之际共同发表研究报告,题为《我们天涯成比邻》,首先提出全球治理概念并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全球治理的核心观点就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全球共同面临的各种矛盾往往需要具体的政府、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 etc 共同参与、合作、谈判互动解决,其过程往往就是不断强化国际间行为规范和国际协调机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便更快形成各种具有相互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有效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如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出现的 G20 集团,已经有效发挥各国共同应对危机的作用,促使世界经济摆脱了陷入全球大萧条的境地。国际上协调磋商机制积极行动,共同施策,推进国际社会行为加快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一致性。

虽然全球治理观点在世界上仍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尤其在处理全球治理与主权独立的关系领域尚存较大分歧。而中国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可以促进全球治理紧紧围绕“公平合理、包容发展、权责共担”的方向展开,以利通过实施全球治理形成的倒逼机制促进中国国内改革,更有利于从全球治理中获得和平发展机遇以及促进全世界的和平发展。

国际上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观、国际权力观、全球治理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共同价值基础。中国提出构建互惠互利的和谐世界与全球共同价值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互惠互利的和谐世界包括:政治多极、经

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持续。政治多极主要是指: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主要国际力量的中心之间应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力量框架和多边的行为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经济均衡主要是指: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能够获得共同发展,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发展,发展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之追求。文化多样性主要是指:世界各国保持文化多元,保持人类思维活力,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更多答案。安全互信主要是指:安全是共同的,别人安全,自己才有安全,实现安全的有效手段不是冷战加威慑,而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环境可持续意味着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把可持续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国际社会不同的价值观主要服务于各种国家的现实利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一个长期、复杂、曲折不断的前行过程。如果各国政治家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一个更高层次的、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是可以建成的。^[8]当代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与要求之一是:经济一体化。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使加入同盟组织的国家之间有区别地减少或消除含贸易壁垒的商业政策^[9],这就必然要求全世界各不同经济体之间彼此相互开放,互通互联、相互依赖,不断形成利益共享的有机体。现实世界中,一定区域内多个国家间的政府通过谈判协商,建立起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共同机构,制定让货物和服务更自由流动的经济政策,消除各种关税壁垒,破除国别之间各种投资障碍,加速实现区域内协调发展、互利互惠以及各种要素自由优化配置,不断推进政治经济高度协调统一。各参加国可以根据它们的具体情况、条件以及目标要求,在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等多种一体化形式中进行选择。无论是哪种实施形式,其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不同国家间、经济主体之间完全的经济联盟,即追求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最高级的形式——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

因此,构建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人类利用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活动日益频繁,但大自然随之而来对人类的过度行为进行频繁报复,环境污染等各类极端事件带给人类一次又一次巨大灾难。上世纪40年代美国洛杉矶光化烟雾致人死亡事件、50年代伦敦酸雾事件、日本水俣湾怪病事件、80年代印度博帕尔化学品泄漏事件等等,均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及民众伤病死亡。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曾以研究环境和发展问题为契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首次提出“若世界按照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及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这个星球迟早将达到极限进而崩溃”,引起国际社会激烈争论。随后,联合国组织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1983年,联合国成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式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围绕可持续发展核

心问题,通过了被称为地球宪章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文件。2002年,联合国又在南非召开“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2012年,各国首脑再次于里约热内卢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峰会,重申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探讨相关成就与不足,发表《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

中国从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始就参加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历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和实践等方面都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1994年中国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6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前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里约峰会上指出,中国过去3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贫困人口减少2亿多,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中国用占全球不到10%的耕地和人均仅有世界平均水平28%的水资源,养活了占全球1/5的人口;过去6年中国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1%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5%左右。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免除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约300亿元人民币债务,对38个最不发达国家实施了超过60%的产品零关税待遇,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这些数据说明,可持续发展不仅已经从理念变成了中国政府的行动纲领和具体计划,而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0]

命运共同体理念一经提出,就在中国的开放与外交层面赋予了现实意义。这一意义在国际层面具体表现为与周边国家,特别是和东盟的关系层面之上,也即努力构建与周边国家协同合作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更是强调要用“命运共同体”定位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当前中国周边国家中,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合作的共同体意识较强的区域性组织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我国正积极推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就是命运共同体在周边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体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了以下积极的效果。

(一)有力减弱了美国对中国在东盟地区增强主导作用的疑虑。在建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表现了对美国开放地区主义的承认,并不会挑战美国的东南亚同盟体系,同样缓解了美国对于其同盟体系崩塌的忧虑。其亮点在于,中国和东盟对于惩处犯罪、打击毒品以及动植物保护等非传统领域的合作符合美国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减轻了后者的忧虑。

(二)加强了东盟国家对于中国的信任,缓解“中国威胁论”不良影响。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外交工作上充分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明确提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指导思想,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大政方针^[11]。例如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以省为主体开展的次区域合作中,相差无几的经济发展阶段使得广西、云南两省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更加顺畅,促进了边境矛盾的化解、经济文化交流等。

(三)以自身发展推动总体发展,发展过程中强化共同利益,欢迎东盟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这将在客观上提升中国的体系影响力,强化区域合作模式,承认和协助东盟在东亚地区内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作用。在这样的发展合作前景下,亲诚惠容的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在未来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发展目标也为未来外交发展指明了道路,中国与东盟互相刺激需求,增加就业交流,共同协商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化解分歧矛盾的前景向好。

(四)以高层交往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高层领导的频频出访,展现了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态度,“亲是指要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友好情谊,诚是指以诚待人、以信取人的相处之道,惠是指践行惠及周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容是指展示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大国胸怀。我们要同周边国家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认同、更支持”^[12]。中国不因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威胁恐吓东盟任何一国,反而不断加大对东盟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援助力度,扫除各种障碍,扩大人员往来,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不断扩大对亚洲国家的投资,参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其实现自主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五)以安全机制的合作建设力求周边的安全稳定,通过法制化的框架约束不同国家的行为。这体现中国用平等协商、沟通交流方式解决问题的态度。如在南海问题争端解决采取双轨思路,努力与多方订立行为准则等,确保不会将周边矛盾扩大为冲突和战争。

(六)通过文化交流、人文沟通的促进和努力,增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文化认同。努力推进共同体中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有利于扩展友谊,体现中国人民求同存异、包容合作的大国胸怀。开设孔子学院等方式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了中国的优秀价值,可以突破中国崛起的文明冲突问题。

注释:

[1]徐亮:《“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意义》,《唯实》2015年第9期。

[2][4]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04/c1024-23102653.html。

[3][7]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 携手打造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

[5]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关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4月8日。

[6]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言》,《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

[8][10]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

[9]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11]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

[12]李克强:《在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http://news.ifeng.com/a/20141115/42478354_0。